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邓文宽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史的珍贵资料
也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
《玄象诗》是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
“年神方位图”的肇发其端者便是敦煌历日
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上的两次月食预报
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邓文宽著. —兰州:甘肃
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046-1

I. 敦… II. 邓… III. 古历法—研究—中国
IV. 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961 号

责任编辑:薛英昭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邓文宽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8 字数 30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423-1046-1/P·4 定价:30.00 元



作者（右）与受业导师张广达教授在一起

（2000年8月27日于蒙特利尔）

作者与马克·卡林诺斯基教授、风仪诚先生探讨学问





作者在“第36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

(2000年8月28日于蒙特利尔)

作者在工作



中卷三

于中且著中

自擬三度書長寄量三日之期方初始述求似各果有獲各盡其
生而不厭夫故曰舒量舒之心

高昌延寿七年（630年）历
 日（残）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
寿七年（630年）历
日》（残）

天德元年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土	土	水	火	木	木	金	金	土	土	火	火

敦煌文献“俄JX 02880”《唐大和八年甲
寅岁（834年）具注历日》（印本）

白雲寺

大馬廐爲自武寧親請州庭下行用建寧四前并有人郎若論種蔣約
自用終建寧亦然忽記神祇一高自祥案看五姓行下沙州永愍五流不
川惟頭各相勸早離辰即得善熟不怕霜冷更有美所得豐熟
生安寧

辛未木火克金水太歲在寅大將軍在子太陰在子歲刑己亥事
戊戌土黃帝納音尾辰三商是商寅地獄地獄主禍神在亥不問禍
德自德時德尤恩母舍大赦春壬子夏寅十月大寒入子

同各相親者有誠位至南宮藏前及使用日藏對藏後除年廿戌收

往三日不拜官移徙不野夫妻
赤頭應會者
二月外躁
三月至服內
四月至服外
五月至服外
六月至服外
七月至服外
八月至服外
九月至服外
十月至服外
十一月至服外
十二月至服外

手足 廿四日手揭明 廿五日足揭明 廿六日留 廿七日疎於陰 廿八

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大 五月小 六月大 七月小 八月大 九月小
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大 五月小 六月大 七月小 八月大 九月小
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大 五月小 六月大 七月小 八月大 九月小

[illegible]

大歲時禁有官錢者移後遷治府衙前奉古宮後在川西
 天本歲歲前九柱九伏不用
 歲歲後下歲前祭天拜接吉

日辛酉木危
日庚申木破
日乙未火執

大歲後不用反激不寧可事
大歲後記憲齊治病吉移棟壞屋宜同
大歲後記憲齊治病吉移棟壞屋宜同

日庚戌水成
子金開取
龍
大天
歲失
後母
治井
吉

[illegible]

敦煌文献 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年)具注历日一卷并序》(部)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
(1407年)具注历
日》(残)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序

■张广达

邓文宽教授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他继刊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与他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部大型文书汇刊与校释相配套的又一部力作。两部文书汇编和即将刊出的本论文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反映了文宽多年来孜孜研究敦煌、吐鲁番、黑城子出土的以及散失天下若干晚期的天文历法文书的概貌。

文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有过研究天文历法史的经历。这样，在他决心以研究唐史为志业，并肆力于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处理天文历法文献的独特条件。他以古天文知识为基础阅读历代正史中号称艰深的天官书和历法志就有较多的方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文宽治史的一种幸运。天文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关系着王朝的推考天人、校定正朔，下涉及小民日常生活的四时宜忌。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史学家大多精通天文历



象。例如，司马迁（公元前 145 或 135 ~ ?）是先与壶遂等人完成造历事业而后才继续其父述作之功的。司马光（1019 ~ 1086）也有《通历》八十卷之作，他在历法方面的准备功夫使他的《资治通鉴》得以建立在坚实准确的年代、正朔的考订基础之上，这反映在他的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之中。《目录》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上栏著录岁阳岁名和依据刘羲叟（1017 ~ 1060）《长历》的气朔闰月及七政之变，下栏列举《通鉴》正文的历年大事纲要。刘羲叟生与司马光同时，强记多识，长于历数，通晓唐代八历，尤其推崇八历中的《大衍历》，撰有《刘氏辑历》，欧阳修专门委任他纂修《新唐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为了明了中国纪年和正朔体系这一时间框架，按理说应该懂得一些天文历象和历代历法，然而，由于这方面的训练过于专门，个人精力终有极限，因而往往无暇顾及，许多治史者常常以此为憾事。文宽现在的研究不仅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天文历法方面开辟了崭新的园地，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起着部分历谱的作用，便于不熟悉历法的人们考史、证史之用，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读文宽的论文使我对他的创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敦煌出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的历书，经文宽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当时准确地预测到了两次月蚀。又如，文宽对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历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份 834 年的雕版印刷历本，应当是迄今人们找到的历史上标明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我国雕版印刷

术的发明年代现在还不能确指，推测当在7世纪。前此所知标明最早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现今收藏在伦敦英国图书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文宽考出的834年历本将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三十四年，许多权威著作在这一点上将会改写。本文集中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历日与当代通书的文化联系。文宽发现，从1182年到1998年，中国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天都不曾间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错误。经文宽考证，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的《宣明历》一直使用到892年，并且在日本、朝鲜使用时间更长；这种唐代以来的具注历实际上与今天港、澳、台乃至东亚，1949年以前大陆上居家必备的《通书》、《通历》、《时宪书》等一脉相传，有千年以上的沿袭关系。

在这里，文宽的考证实际上阐发了东西文化史上久被忽视的重要篇章。早在187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约三十年，厦门的英国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首先注意到中国南方使用的历书中以“蜜”字注星期日的问题。他解释不出原因，于是在福州传教士保龄（Stephan Baldwin, 1835~1902）于1868年5月创刊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中国和日本札记与疑问》栏内刊登了一则有关的札记。这在传教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知名传教士有德贞（Johm Dudgeon，即德约翰医生，1837~1901）、卫礼（Alexander Wylie，即伟烈亚力，1815



~1887) 以及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华布道团团长鲍乃迪大教长 (Palladius, 1817 ~ 1878) 等多人。卫礼在《教务杂志》第四卷 (1871 年 6 月号、7 月号) 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 名《中国有关周末安息日的知识》。传教士出于职业原因, 对中国人居然也有周末安息日 (sabbath) 的记载非常感兴趣, 这是可以理解的。卫礼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搜集了清代允禄等奉敕纂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1739 年刊本) 和当时华中、华南发售的《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等时宪书, 指出了其中有关二十八宿和年神方位, 月事吉凶, 用事宜忌以及日月五星下值人间的七曜别行、禳灾法, 并将有关记载追溯到 759 ~ 764 年不空 (705 ~ 774) 和杨景风共译的《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收在本文集中的文宽的一系列有关时宪书或通书的论文, 实际上是以新资料对中断了将近一百三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问题做了新的概括。

文宽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发现, 原因在于他读书认真。从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阅读到文章的营构断制, 心神贯注, 一丝不苟。这里可以举出文宽在校注《坛经》过程中从形 (文字校勘)、音 (音韵)、义 (训诂) 三方面, 特别是从方言、音韵方面着手突破“文字障”为例以作说明。为了持论有据, 文宽在处理方音替代字和注释中古口语词上下了功夫, 证实《坛经》不同文本中均为溪纽的“起”、“去”两字, 因西北方言中的止摄微韵与遇摄鱼韵混同而可以互注, 还有“端”“定”互注, 以“审”注“心”, 韵母“侵”“庚”互通, 等等。核以

高本汉（参看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罗常培、董同龢、李荣、周法高、王力、普立本、白一平、李珍华与周长揖、高田时雄、平山久雄诸家有关的拟音，文宽找到的验证资料似是以上诸家未曾措意的。从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引发的“鱼”、“虞”音值的辩论迄未终结，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不时出现在中、日和西方的汉语语言学家的专著和论文中。早在1923年，林语堂在读汪文之后写文章指出，“歌”、“鱼”合用现象，“须以方音解明它”，“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地区别出来”。其后，沉兼士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作序也指出：“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文宽追究方音转变流衍而做的校读工作，证实了先贤的卓识，激活了今后可以开拓的又一方面。文宽的创获，大多类此。

文宽早年寒苦，今日学业有成。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反映着他笃志向学、踏实勤恳的业绩，其中凝结着常年辛劳。今天，人们有多种计算机数据库可供检索词条，有电子扫描技术迅速输入资料。从一方面说，新技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搜集材料层次上的操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更加加重了研究者的思考负担。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原理（所谓“后设史学”、“元历史”、“大历史”、“大写历史”、“上层次历史”、“新历史主义”）和对具体历史撰述的操作（“小写历史”、“下层次历史”）都有所质疑。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盘诘不